

---

# 辛亥革命后浙江新闻事业的变革和发展

范芸芸<sup>1</sup>，周炜<sup>2</sup>

(1. 浙江外国语学院宣传部，浙江杭州 310012；

2. 杭州市纪检监察信息中心，浙江杭州 310026)

**【摘要】**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对浙江新闻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以1911年浙江辛亥革命胜利为分界线，浙江新闻事业快速发展，浙江报刊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新闻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报纸形式也更加接近于现代报纸。

**【关键词】**辛亥革命；浙江；新闻事业

**【中图分类号】**G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12)05—0078—05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浙江，以光复会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群起响应，在看得见的暴力革命之外，新闻舆论宣传始终是辛亥革命浙江战场上另外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大众传媒(当时主要是报刊)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有力地促进了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无论是新闻报刊的数量，还是新闻传播理念、新闻业务等都较革命前有所增进、革新和发展。社会的大变革势必会影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事业无疑也受到了影响。

## 一、辛亥革命的胜利为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创造了环境

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浙江的政局和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革命后的浙江，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新的社会气象也渐渐扩散，这为浙江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奠定了基础。

政治上，民主政治的实践为新闻事业创造环境。1911年11月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浙江军政府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核心的，依据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1911年12月10日，行使立法权的浙江省临时议会正式召开。临时议会制定的法案、决议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约法》规定，“凡立于本军政府之统治下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书信秘密之自由；迁徙住居之自由；信教之自由”，“人民有呈请于议会之权。人民有上诉于行政审判院之权。人民有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上诉于行政审判院之权。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人民也有依法律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等<sup>[1]</sup>。这些，此前在浙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次民主政治的实践为民国初期浙江近代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从法律上对言论、出版自由予以了保护。

---

收稿日期:2012—08—23

作者简介:范芸芸(1982—)，女，浙江嘉兴人，浙江外国语学院宣传部编辑，文学硕士；  
周炜(1983—)，男，浙江台州人，杭州市纪检监察信息中心信息员。

经济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浙江省内关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浙江军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举措：如蠲免全浙钱粮金一足年，取消厘金制，改为统捐，降低税率，减轻不属于统捐的生丝、茶叶、酒等的特别税……废除各埠码头肩抬挑驳等劳工所出的税收则例<sup>[2]</sup>；整顿省城商品陈列所，扩大浙江工、农业产品影响；给企业发放银行贷款等。在政府支持下，浙江企业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仅1912年，浙江省新创办的工厂达90多家<sup>[3]</sup>，如造纸、印刷等行业的发展就较为明显。1912年的《越铎日报》上，“中兴印书局”“文茂山房刻字印刷”等广告几乎每期可见；（民国）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科关于杭州市的经济调查中，“纸业”部分中就有“西报纸”这一纸的品种，价格也较一般的白纸要高<sup>[4]</sup>。工商业发展同时又意味着人们对于各类信息的需求量的增加，这也进一步刺激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出版的《越铎日报》《赤霞报》《彗星报》等报纸都有固定版面刊登“商情信息”，不但有本省、本地的信息，还有上海等大城市的商情信息；火车、轮船时刻表也是报纸广告版的“常客”；工厂承接业务、商店供应商品、学校招生、报纸创刊等各类广告引人注目地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和二版；各种综合类、商业、专业报刊纷纷创刊。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革命后工商业发展对近代报刊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文化上，新式教育为新闻事业培养了人才和受众。民国初年，浙江新式教育获得了较大发展空间：在初等教育方面，建立了大量的新式小学。在中等教育方面，建立普通中学、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经过一番裁撤、新建、升格，浙江高等学校数量有所增加，除之江大学外，有医药、法政、工业、农业、体育等5种专门学校，专业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教育改革基本实现了从封建官吏教育到资产阶级国民教育，从重道轻艺、重文轻武的片面教育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从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教育到男女平权、男女同学的教育的三大转变<sup>[5]</sup>。对浙江新闻事业来说，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才，既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受众，又是各类办报人才的储备库，为浙江新闻事业提供了人力和智力上的支持。如《越铎日报》主笔宋紫佩等是鲁迅的学生，民国著名记者邵飘萍童年和少年受的是传统教育，但后来进的是新式学堂，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

## 二、辛亥革命后浙江出现了一次办报热潮

民国初期，浙江出现了一次办报热潮。仅民国成立约半年时间，在浙江新创办的报纸就有20余家。民国初的几年内，浙江省先后创办的报刊约有50家。这些报纸中，有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有《平民日报》《公民日报》《新世界》《新浙江潮》《自由报》等政党报刊，有《东瓯日报》《民铎报》《醒报》《民兴日报》《赤霞报》《天职报》《天觉报》《彗星报》《之江日报》《浙江民报》《警铎日报》《禹域新闻》等综合类报刊，也有《农学会报》《法学》《道路杂志》《警察杂志》《教育周报》《绍兴县教育月刊》《浙江军事杂志》《医药观》等专业报刊。

与办报数量的增加相对应的，是报社对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数量需求进一步增加和业务能力要求进一步提高。早在辛亥革命前，不少报馆虽然也重视访员（相当于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的建设，但是，浙江新闻界的主力仍由留学归国的革命党人、受过教育的开明士绅、名流、著名文人等组成，他们主要从事编辑工作，采访、写新闻的少，写评论的多。辛亥革命后，浙江报刊更加重视记者和通讯员队伍，“新闻之价值视乎访员。……（访员）当处于至尊极高之地位，以指导国民、黜陟社会为己任，无一毫私意存乎其间”<sup>[6]</sup>。这与19世纪《泰晤士报》三大主笔时期称记者为“无冕之王”有异曲同工之妙。1912年11月3日出版的《天觉报》上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愿为本报访员者鉴》：“本报访员分义务、特别、普通三种。……（特别者）每月新闻至少以十五则限，不能间断，均须具有关系并叙事得体者……普通者每日新闻以两则为率，须词句清晰并非琐屑细事者……如遇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或民贼受极大贿赂，有能独具识力确知证据报告本报者，尤当特别报酬以酬热忱。”<sup>[7]</sup>除了《愿为本报访员者鉴》中公开对不同类型“访员”分别提出相应的新闻采写数量和质量要求外，该报社还对“访员”提出了“消息灵通，采访详实，叙事简洁，一稿专投”的基本要求<sup>[6]</sup>。报纸通过“访员”和“报告本报者”把采集新闻的“触角”延伸到了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越铎日报》创刊后，连续几期刊登招聘访员广告，除绍兴本地的，还要“加聘各要埠访员，若南京、武汉、天津、长沙、成都、福州、广州、上海、杭州、重庆、宁波、镇江等处，且不惜重赏”<sup>[8]</sup>。项士元主持《之江日报》编务工作以后，注重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办报，招收了很多进步青年到报社担任采编工作。1911年，原在金华担任中学历史和语文教员的邵飘萍因为在上海报纸上撰写通讯而受到革命党人杭辛斋注意，被聘请到杭州担任《汉民日报》主编。这样的例子很多，更多的生力军加入新闻工作

者队伍，不仅为报刊社充实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为浙江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1913年5月17日，浙江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团体——杭州报界公会成立，在浙江新闻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一页。

除了各报社自身招聘的通讯员外，浙江省历史上第一个通讯社也是第一个民办通讯社——民国新闻社于1912年在杭州成立<sup>[9]</sup>。随后，新闻通讯社接二连三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浙江各地涌现。“通讯社是从事采集、加工和提供新闻信息，为其他新闻媒体和各类用户服务的新闻机构。一般拥有人数众多的记者网点，广泛的新闻来源，强大的通信技术……”<sup>[10]</sup>虽然浙江这些新闻通讯社总体还十分弱小，但其作为新闻事业的新生力量，是浙江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浙江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 三、辛亥革命对浙江新闻事业变革的影响

辛亥革命给浙江新闻事业带来的激荡远不止此，伴随新闻事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办报高潮到来的是浙江新闻事业整体上的前进与变革，新闻传播的理念、社会对新闻的看法、报刊的内容、报刊的形式等都有了较大变化。

首先是新闻地位的上升。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革命和启发民智的需要，浙江报纸虽然大多包括评论、新闻、副刊和广告等内容，但多以政论及各种翻译介绍西方学科知识的文章为主，新闻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杭州白话报》为例，1904年半年中，《杭州白话报》刊登论说类14篇，时事评论类33篇，历史故事类20篇，而新闻报道类极少<sup>[11]</sup>。辛亥革命后期，随着办报者开始注意吸收西方新闻学理论，在采编业务上不断加以改进，新闻开始唱起头角来了。到了辛亥革命后，新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报刊内容由革命前的政论为主转向以新闻为主，新闻内容也从讨论救国、鼓吹革命延伸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报纸刊文指出：“报纸之价值全在新闻”<sup>[6]</sup>，把“新闻”提到了决定整张报纸价值的高度。以《越铎日报》创刊当月（1912年1月）的内容为例，新闻数量远远大于其他类的数量，占了总数的80.05%<sup>①</sup>。就连后来转而拥护袁世凯的《新浙江潮》，为了吸引读者，每天出版的一张半报纸中，有一张是新闻，半张是副刊。新闻地位的上升还在其他内容如评论中体现出来：1911年以前的报纸评论多为“论说”，直接发表观点和见解，内容缺乏新闻性。辛亥革命后，紧密结合时事新闻的时评已经成为评论中的重要种类。革命胜利后不久创刊的《汉民日报》上，主编邵飘萍撰写了大量时评，结合时事，指摘时政，文风犀利精悍，引起较大反响。

在报纸的版面编排设计上，新闻地位进一步被凸显。近代报纸刚刚在浙江兴起的时候，新闻常常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除了单调的“四字题”外，甚至很多新闻没有标题。1911年后，随着对新闻重视程度的提升，浙江报纸上出现的新闻标题趋于多样化，单行标题、双行标题、三行标题都可以从中找到。如《越铎日报》上就常采用双行或者三行的新闻标题，当时有《陶先生被刺死不瞑目》《学塾牌亦遭失窃窃之何用是亦怪闻》等。重要的新闻内容或者较长的篇幅，还制作小标题，使得读者阅读更为方便。如《天觉报》第3号刊登的《俄国革命潮》一文中，就使用了“运动泄露”“调兵内防”“军队戒严”“冀日牵制”“征蒙有机”5个形式一致、字数相同的小标题<sup>[12]</sup>。在版面设计上，新闻与广告、副刊等内容明显区分。1912年创刊于台州海门的《赤霞报》，“地方要闻”“各省电文”“各省纪闻”等新闻栏目采用简洁严肃的风格编排，文与文之间以细线分隔，与印着花卉图案的“小说连载”“文苑”等栏目明显区别。

第二是新闻语言的进化。新闻语言的变化与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革命前，进步报刊以鼓吹革命、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为己任，为了扩大宣传面，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能读懂报纸，纷纷放弃文言文，采用了稍显啰嗦的白话来写作。而革命以后，报纸的“鼓吹”功能减弱，传播信息的功能增强，为了在有限的版面内尽可能增加新闻信息的“量”，新闻语言从繁琐进化到了简洁——这不是简单的从白话文复归文言文，而是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语言再提炼。这种新闻语言克服了口语式白话文啰嗦的缺点，以“白话”为基本语素，夹有少量文言，从而形成了现代新闻语言的雏形。比如《越铎日报》1912年1月17日第15号刊登的《彩票店其果复活耶恐怕活不成》：“彩票一项类如赌博，上则有伤国体，下则妨害民财……咨议局决严禁，不论何种彩票，不准来浙售卖，实是正当办法。”语言既简洁，又通俗易懂。读者称赞《越铎日报》“言不在长，有文则名；字不在多，惟简则精”<sup>[13]</sup>，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将简洁作为新闻语言的一项优点。革命后部分浙江报刊在新闻中使用类似于“、”

的标点符号，逐渐摆脱了革命前文不加点，或者以空格、在文字右边标注圆圈符号作为断句标志的状况，使读者断句更为顺畅，阅读更加流利。

第三是报纸形式的变化。20世纪以前，报刊不分和报刊分离的状态并存。浙江各地早期的报纸，大都为32开本，木刻雕版或石印。很多报纸仍采用书册式装订，封面上仅有报名、时间和期数，后面才是正文内容，比如《杭州白话报》《萃新报》《湖州白话报》等，都是如此。直到1901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散页报纸逐渐取代了册装。《绍兴公报》《四明日报》等报纸率先采用4开4版或对开4版的白报纸散张两面印刷，《危言报》和《全浙公报》创刊即为对开2大张(8版)，均按当时汉字书写习惯从右至左直行编排。这一时期，报纸的周期五花八门，有月出一报的，也有半月报、旬报、周报、日报等。辛亥革命后，报、刊已经明显分离，期刊一般以“杂志”来命名，报纸则一般称“××报”。大部分报纸的名称都冠以“日报”的字样，很多名称中没有“日报”字样的报纸也基本上都是日出一报，许多报纸还特意在报头的报纸名称上面印上“日刊”字样。纵观辛亥革命后在浙江出版的报纸，绝大部分是散页对开报纸，杂志则是书册式的装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以新闻报道为主要内容，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散页连续出版物。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可见辛亥革命以后的浙江报、刊在形式上已经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和杂志的特点。

第四是社会和报人对报刊看法的进步。辛亥革命前，很多浙江革命党人已经认识到：报刊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人民中间最聪明、最强有力、最有绝对权力的意见就是报刊舆论。辛亥革命后，几千年来钳制、禁锢人民思想和言论的封建“言禁”被打破，人们对于报刊的看法更加深入，新闻自由成了人民努力争取的权利。报纸成为民众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的渠道之一。如《浙江公报》上，经常刊登《国民程鹏等呈请成立崇实改良党》《公民李唐稟请共和建设会立案》等建议文章，对军政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传播、监督政府等功能的认识也在进一步加深。对于专门从事报刊出版的报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实践中，他们进一步强调了报刊、舆论、新闻自由等的重要性。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因发现报刊舆论的强大力量而投身办报实践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报人们进而发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提出了舆论不可压制的观点。1912年1月3日，鲁迅在《越铎日报》创刊辞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的宗旨<sup>[14]</sup>。鲁迅提出，报纸发表新闻应该反映事实，对于社会“污浊”则要坚决批判，“不欲守口”“无所畏惧”。辞去教职到《汉民日报》任职后，邵飘萍就注重发挥报纸的“社会公器”作用，监督政府，提倡民权，虽因抨击专制军阀和贪官污吏而遭到打击报复，但他毫不屈服。这与他后来提出的“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以及独立办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觉报》创刊的祝词中，将代表舆论的报纸地位提到了与国家强弱紧密相关的高度。《越铎日报》的读者投稿中还引用了新闻报刊是“民史”的思想，认为报纸受到“万众欢迎”，“语语出金石，行行放光明……高擎自由钟，欢歌自由文”，起到了“可以开民气，可以发公愤，怯奸魔之肝胆，振国民之精神”的作用<sup>[13]</sup>。虽然当时报人们的新闻思想尚没有成系统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只零星散见于一些言论和文章中，但是今天人们还是能从中管窥当时报人们新闻理念的进化。

近代大众传媒出现以后，因其所具备的“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sup>②</sup>三功能，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浙江的新闻事业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磨炼和成长。辛亥革命后，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浙江新闻事业发展环境为之一新，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虽然其后浙江政治和社会也时有动荡，但是经过革命洗礼后出现的浙江新闻事业整体上的变革和前进的轨迹，则大致上难以改变了。浙江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 注释：

①由于现存的报纸不全，故统计数据中少了1912年1月3日—1月8日、1月16日的报纸和1月23日的第三、第四页。本统计数据不包括广告。

---

②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 1948 年的著作《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大众媒介“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的“三功能”。

**参考文献:**

- [1] 夏新华, 胡旭晟.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623-624.
- [2] 金普森, 陈剩男. 浙江通史民国卷:上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80.
- [3] 汪林茂. 浙江辛亥革命史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282.
- [4] 民国浙江史料辑刊:第一辑 [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1.
- [5] 张彬. 浙江教育史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417.
- [6] 编辑部谨告已订立之访员 [N]. 天觉报, 1912-11-03(3).
- [7] 愿为本报访员者鉴 [N]. 天觉报, 1912-11-03(1).
- [8] 本社特别启事 [N]. 越铎日报, 1912-01-17(1).
- [9] 浙江省新闻志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544.
- [10] 冯健.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63.
- [11] 薛燕. 从《杭州白话报》看近代新型国民的打造 [D]. 杭州:浙江大学, 2006:10-11.
- [12] 俄国革命潮 [N]. 天觉报, 1912-11-03(6).
- [13] 祥春. 越铎报铭 [N]. 越铎日报, 1912-01-18(4).
- [14] 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39.